

中国雕版印刷术及其中反映的净土信仰

武玉秀

摘要：在经历了汉字楷体化、纸张的普遍行用、雕刻技术成熟等前提条件之后，雕版印刷最终产生于隋代，经唐五代的发展，到宋元时期全面繁荣，明清时期达到历史巅峰。而雕版印刷品又与民间信仰密切相关，其中对净土的信仰尤为流行，且历时长久，自五代大量刊刻的弥陀、观世音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地藏菩萨等版画开始，至宋代雕刻《竺兰陀心文经》等经文，直至明清大规模雕刻《陀罗尼》等经文，在相关的发愿文字中都出现了倾向于净土信仰趋势。由此可见在中国民间，从晚唐五代直至明清，这种净土信仰的热情在雕版印刷术中是一路传承的。

关键词：雕版印刷术；版画；净土信仰

中图分类号：K85.3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12)02-0074-08

一、雕版印刷产生的历史背景

就汉字书体发展考察而言，汉末至魏晋，简牍作为载体文字，处于隶楷转型之间，南北朝碑刻墓志文字，是反映楷字发展成熟的重要分期段落；隋代墓志碑刻等场合使用的石刻文字，直接继承南北朝楷书水平；唐代楷书，标志着楷字的定型。

唐代楷字定型，是唐宋之际文字传播方式由因人而异到雕版印刷转换的内在因素。作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对于人类知识的积累与传播，对于促进社会进步所产生的影响，至巨至广。印刷术是经济和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需要一些必要的条件与技术，诸如笔、墨、雕刻技术、纸张等。只要这些条件具备，社会上又有对某种文字载体成批量、快速复制的需求，印刷术便呼之欲出。

对雕版印刷产生至关重要是印刷文字的载体——纸张。至唐代，纸写本普遍行用，已经临近能批量、快速复制书籍的印刷术门槛。纸普遍流行，这主要表现在造纸原料的增加，技术的改进，产纸

区域的扩大。在各类雕刻文字中，真正对印刷技术的产生给以启迪作用的则是印章。因为在文字雕刻技术中，有一种反向字体和凸形字体。到了南北朝时期，碑刻上出现了反向文字和阳凸文字，表明印刷所需要的文字雕刻技术已臻成熟。隋唐时期，随着佛教的大发展，抄经的方法耗时费力，已远不能满足教义传播的需要。出于图文复制技术的迫切需求，在经历了石碑雕刻捶拓复制、镂花模版刺孔漏印、印章模像捺印等早期复制技术之后，又有造纸、研墨等物质奠定的物质基础，一种新的图文复制方法便创造出来，这种技术就是包括版画在内的雕版印刷。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模像捺印，佛徒印像，近年敦煌、吐鲁番及新疆等地颇有发现，有铜制、木制之别。《云仙杂记·印普贤像》内云：“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关于这种印像的模子，敦煌石室有遗存，罗振玉在《莫高窟石室秘录》一书中说道：“刻阴文佛像，长方形，上安木柄，如宋以来之官印然，乃用以印象者，其余朱尚存。”佛印之来源，盖得之印度。《法苑珠林》卷三十九引《西域志》谓：唐显庆五年（660）九月二十七日，菩提寺主名戒龙为汉使王玄策等设会，对使人以下，各赠华氍毹十段及食器云云。具录献物时，有“佛印四”之句，即其证也。

收稿日期：2011-12-26

作者简介：武玉秀（1984-）女，山东沂水人，扬州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方向：唐至宋初净土宗文学与艺术。

李斌城主编《唐代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636—1639页。

这些佛教像印模板，在印度、中国因宗教的需求而不断的被翻刻，是一种信仰的象征，正如郑振铎先生所说：“初期版画之为宗教图录，信仰象征，中外无殊也。”向达在《论唐代佛曲》一文中进一步说道：“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就现存的文献同遗物看来都先起于寺院。佛教像因由印度传入中国，于是玄奘用回锋纸印普贤像，敦煌发见的有千种摺佛，也是用像印印的。由像印进而为单片的发愿文以及最普通的经典如《金刚经》之类，然后民间为所影响，始有历日书小学字出现。先是带宣传性质和祈求福利的印刷品，于是始由此一转而入于实用。”

这种模像捺印佛像直接刺激了雕版印刷——书籍镌印。这一创造性的发明，不仅为佛教的深入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工具，也为中国版画艺术的发展开启了广阔的前途。哪些书籍需要批量生产？主要是两类文字材料：一类是佛教经典，另一类是同民生密切相关的历日、医药之类。在唐代，印刷之所以能成为一个行业而得到长期存在和发展，是与社会上的需要分不开的。佛教在唐代发展到高峰，僧俗信徒很多，佛经佛像的需求量自然很大，这就给印刷业带来了生机；另一方面，对信徒来说，转经、刺血写经和造像等活动都被认为是很大的功德，而印刷可以高效率地制作佛经、佛像，使佛教得以更迅速、更广泛地传播。佛教在雕版印刷上所起的重要作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磨灭的。唐朝瓦解以后，中国的印刷术继续发展。到五代时期，印刷事业仍然在蓬勃发展。

二、版画的产生及其早期发展

版画，是中国美术的一个重要门类。版画乃以刻与印为两大基本步骤之绘画品种，刻于版而拓印于纸帛。就中国古代而言，版之材质以木为大宗，石印、铅印和铜版等出现俱晚。古代版画个别还有套色漏印，如1974年山西应县木塔发现发现的《南无释迦牟尼佛》漏印像，为我国最早彩色套印版画。它的制作，由于经过刀在板上得镌刻，它的

线条，它的艺术形象，决不会等同于手描的画稿。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版画的國家。中国版画无论是雕版版画、活版版画、彩色套印版画，在世界上都居领先地位。鲁迅先生在《木刻纪程·小引》中说：“中国木刻画，从唐到明，曾经有过体面地历史。”

雕版印刷始于何时，其说不一，雕版印刷开始的年代，说法很多，隋或唐初说似较可信。关于隋代说，据明陆琛《河汾燕闲录》记载：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十二月八日，敕废象遗经悉令雕撰。此或即雕版印刷之始。”近时发现隋炀帝时大庄严寺沙门智果大业三年（607）四月刊记之佛画断片，足为明证。乃简素线画之彩绘，纵十二寸半，横十寸半，与东域法隆寺陀罗尼同样用黄麻纸成。唐冯贽《云仙散录》引《僧图逸录》：“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公元645年（太宗贞观十九年乙巳），玄奘由印度回国。如此大规模的印造雕像，说明在此前雕印技术已经有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历史。潘吉星教授将其定在公元590—640年的50年间。初唐遗存刻本还有《阿毗达磨大毗沙婆论》，罗振玉在《莫高窟石室秘录》中说：“予于日本三井听冰民（高坚）许，见所藏永徽六年（655）《阿毗达磨大毗沙婆论》卷二百四十四，其纸背有木刻楷书朱记。文曰：‘大唐苏内侍写真定本’九字，与宋藏经纸后之‘金粟山藏经纸’朱记同。”此为初唐刻本之确据。《册府元龟》卷一六〇记载，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十二月丁丑，东川节度使冯宿奏：‘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故命禁之。’”关于雕版印刷产生的准确年代？明胡应麟认为“雕本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是很有见地的。至迟在中唐、晚唐时已经逐渐兴起。1966年在韩国发现了木刻《陀罗尼经》印本，刻于704—751年间。成都市望江楼附近的唐墓也出土了龙池坊卞家印卖的《陀罗尼经》，是国内现存最早印本。梵文陀罗尼经咒图唐至德二年至大中四年（757—850）刊行，纵三厘米，横

李仲编著《版画》，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页。

李斌城主编《唐代文化》，第1639页。

薛克翘《佛教与中国古代科技》，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1年，第177—178页。

包铭新主编《中国染织服饰史图像导读》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8页。

王伯敏主编《中国美术全集 绘画编 20 版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2006年重印），第1页。

王伯敏主编《中国美术通史》（第四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330页。

戴蕃豫《中国佛教美术史》，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342页。

三四厘米。1944 年发现于成都唐墓出土的银镯内，为死者生前所随身携带。印本右题：“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近卞……印卖咒本”一行。为四川成都卞家所刻印。据唐至德二年（757）成都改称府，又同墓出土“开元通宝”有“益”字，系益州监所筹。因此判定其刊刻时间的上下限，当为我国现存最早古版画之一。原件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此外，唐代东域留学僧圆载“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末载有“西川印子唐韵一部五卷、同印子玉篇一部三十卷。”当时西蜀印行浩瀚之字书可知。此目录为唐咸通六年（865）写，更在敦煌出土之《金刚经》以前。咸通九年（868）王玠印造的《金刚经》，卷首有版面，正文刻字精美，足见刻印技术已经成熟。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首图，纵二四·四厘米，横二八厘米。1900 年发现于敦煌。全卷由七张纸粘接而成，经摺装。图左上角有“祇树给孤独园”标题，下左方有“长老须菩提”字样，卷末刊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题记。这幅作品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有准确纪年的最早一幅版画作品。原件现藏英国不列颠博物馆。从题记看，这件印经可能是从外地流传至敦煌者。

唐末（837—907）司空图“为东都敬爱寺讲律僧惠确，化募雕刻律疏”。敬爱寺尝藏律疏印本被焚，发愿更雕刻之，募集资金。司空图作此疏，恐在八百年前后。《云谿友议·羨门远》记载：八百年度中叶“纆干尚书泉，苦求龙虎之丹，十五余稔。及镇江右，乃大延方术之士。乃作《刘弘传》，雕印数千本，以寄中朝及四海精心烧鍊之者。”唐僖宗时成都书肆有印刷的各种书籍出售，而且不少地方都有印刷历书。雕版印刷比较发达的西蜀，印刷品主要是占卜书、字书等。后唐时，开始刻印“九经”。长兴三年（932），明宗命国子监以西京的石经为根据，校正“九经”，这项镂版雕印工程由宰相冯道监督，用了二十年时间，直到后周广顺三年（953）六月才刻印完毕。雕印九经，成为政府雕版印书之始。从此，刻本“九经”广为流传。后蜀也专门印制，导致“蜀中文学复盛”。刻印“九经”促进儒学经典的普及，有利于文化的传播。

自从晚唐五代之际雕版印刷逐渐兴盛之后，写经艺术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忽略雕版印刷兴起以前手写经文的重要的历史意

义。这是因为，雕版印刷也是在手写经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目的是为了适应更大多数的民众的信仰需求。至五代、两宋时期，因雕版印刷术的进步和大众文化传播的社会需要而获得长足发展，成为中国版画史上的兴盛时期。在题材内容的选择上，版画最初是与佛教相关的，佛教教义的普及主要是通过一些画有佛经内容的图像开始的，而版画恰是这种图像宣传最快捷、最有效的载体。五代时期，四川的眉山、甘肃的瓜沙、江苏的南唐、浙江的吴越，雕版较唐代更为发达。除刻佛、道、儒经典外，有文学、法律、类书、历本等。保存至今的五代版画则有敦煌发现的版画和吴越版画。

三、敦煌地区的雕版印刷

敦煌地区雕版印刷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其中统治者的支持至关重要。《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版画可对此种雕印术的来源提供历史佐证。上部榜题，左为“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右为“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傅曹元忠造”。下部题记“弟子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管/内营田押蕃落等使/特进检校太傅谯/郡开国侯曹元忠/雕此印板，奉为城隍安/泰，阖郡康宁，东西之道/路开通，南北之凶渠顺/化，励疾消散，刀斗藏/音，随喜见闻，俱霑福/祐。于时大晋开运四年（947）丁未岁七月十五/日记，匠人雷延美。”在敦煌，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发展，雕板逐渐发展为一种职业，出现了雕板押衙。当时敦煌当地也有一批工匠从事雕版印刷业，留下一批作品如版画、文书、图文并茂的佛经，还有一批量绘画所使用（带有印刷性质）的粉本。据 P.4515《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印本）尾部题记：

弟子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
太傅兼御史大夫谯郡开国侯
曹元忠普施受持
天福十五年（950）己酉岁五月十五日
记
彫板押衙雷延美
按：五代晋天福十五年，岁当在庚戌。

总之，不管是手写经文还是雕刻经文，统治者的提倡支持都在其中起来至关重要的地位，另如大宋咸平五年（1002）敦煌王曹宗寿与夫人汜氏就曾

（唐）范摅撰，阳羨生校点《云谿友议》，《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 1313 页。

王伯敏主编《中国美术通史》（第四卷），第 334 页。

花巨资险情匠人编造经帙，后又请人补写新旧经论施入报恩寺收藏，这些手写经卷时至今日对于保存唐宋时期佛教经文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晚唐五代的雕版技术及印品，在当时还播到临国，如日本。

《加持尊胜并大悲真言》及《大佛顶真言》二书印本就被日人“并印子”带回传入日本。此等陀罗尼皆短篇，合三卷印刻者。恐与敦煌所发现五代天福十五年刊不空译之《一切如来尊胜佛顶陀罗尼》属于同类，而为其先驱者。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130多种木雕板印画，大部份是10世纪时，出自敦煌当地的作品。敦煌文献中的印刷品，包括佛经、佛教版画、历书等几类，敦煌文献中保存的来自外地的印刷品还有不少来自四川。敦煌文献中的这批印刷品，不仅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历史的重要证据，其中的版画也是人类美术事业发展历史的见证。敦煌版画中数量最多的是木捺小千佛像；最有特色的是观世音菩萨像。版画的题材内容计有净土变相、阿弥陀佛供养像、文殊师利菩萨、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圣观自在菩萨供养像、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千佛像、普贤菩萨、地藏菩萨、陀罗尼、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等。所有这些内容，都是敦煌地区（主要是敦煌石窟）唐代以来广泛流行的内容和题材。敦煌地区雕版印刷术突出成就表现在镂花雕板印、书籍镌印、版画、发愿文等几个方面。

（一）镂花雕板印：镂花雕板印，佛教徒尤喜为之，敦煌石室中所发现者，有镂花模印之纸张、丝布及画壁。镂花模印之纺织品，其上有两色者、有数色者，皆不带宗教意味。其图案大率马鹿鸭等等，又有一种图案纸与近世深蓝色几何画之糊墙纸极相似。

（二）书籍镌印：《阿毗达磨大毗沙论》，罗振玉曰：“予于日本三井听冰民（高坚）许，见所藏永徽六年阿毗达磨大毗沙婆论卷二百四十四，其纸背有木刻楷书朱记。文曰：‘大唐苏内侍写真定本’九字，与宋藏经纸后之‘金粟山藏经纸’朱记同。”此为初唐刻本之确据。（《莫高窟石室秘录》）

（三）版画：入五代（约950年前后），佛教版画逐渐发达。后晋开运四年（947）刊行《大圣毗沙门天王像》，纵39.4厘米，横25.5厘米。五代

刊行的版画另有《大圣文殊师利菩萨像》纵26.8厘米，横15.8厘米。另有《圣观自在菩萨》、《四十八愿阿弥陀佛》、《地藏菩萨》3幅，与此图风格相近。敦煌发现。这四种版画中里面都突出了净土信仰的有关内容，故兹将其图画内刊刻内容解读如下：

1. 憧憬彼岸——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梵文Amitabha），意译为无量，略称弥陀，另外还有一梵文名称（Amitayus），意译无量寿。中国自北魏以来盛行阿弥陀佛信仰，因而阿弥陀造像也极隆盛。隋唐之际，在佛教“定慧双弘”的影响下，敦煌佛教艺术发生了大转变，以前常见的题材，如本生、因缘、佛传等叙事性绘画和与坐禅观像有关的尊像画，逐渐向净土题材转变，在这一重要转变中，阿弥陀净土思想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随着佛教净土思想在隋代的普及和深入，自隋代以来，人们致力于阿弥陀佛系统经变的创作，在图像中竭力渲染西方极乐净土的殊胜美妙和繁华富丽。这种图像后来在版画中得到应用。

《四十八愿阿弥陀佛像并供养略仪》版画：P.4514(3)A《四十八愿阿弥陀佛》一侧榜书：“甲申年(984?)三月六日右壹大师流次功德(德)记”，文字如下：四十八愿阿弥陀佛 普劝供养受持/夫欲念佛修行、求生净国者，先于净/处置此尊像，随分香花，以为供养。/每至尊前，冥心合掌，离诸散动，专注/一缘，称名礼敬：/南无极乐世界四十八愿大慈大悲/阿弥陀佛。(愿共诸众生一心归命 礼十拜。)/南无极乐世界大慈大悲诸尊菩萨，/一切贤圣，一拜。/然后正坐，一心专注念阿弥陀佛，或万或千；/观世音、大势至，诸尊菩萨，各一百八。念已称云：/以此称扬念佛功德，资益法界一切/含生，愿承是善声同得正念，往生无/量寿国，更礼三拜，即出道场。

2. 慈悲济世——菩萨：是菩提萨埵（梵文BodhiSattva）的略称，菩提意为觉悟，萨埵意为有情，凡修持大乘六度，求无上菩提，利益众生，于未来成就佛果的修行者都可以成为菩萨。菩萨信仰是佛教净土信仰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内容，虽然佛事佛教的中心，由于过于神圣崇高而缺乏亲切感，而菩萨的角色正好在这中间充当桥梁，净土信仰中有一种菩萨叫“引路菩萨”，它指引信徒死后的灵魂进入西方净土世界。菩萨画是指关于菩萨题材的绘画作品，即壁画、卷轴画（绢本或纸本）、版画等平面性图像；此外，还有一些立体的图像，即各种

马德、王祥伟《中古敦煌佛教社会化论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88页。

材质的圆雕和浮雕。严格意义上的菩萨图像伴随着大乘佛教的传入与普及而发展起来,《法华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弥勒上生经》、《弥勒下生经》等佛经的相继译出,为中国艺匠理解印度佛像和制作自己的佛教图像提供了文字依据。唐代是中国菩萨图像完善与发展的主要时期,体现出系统性、完整性、丰富性和独创性,不仅对印度图像直接和大胆的引进与摹仿,还对其有大胆的创造。皇室的扶持、僧徒的努力和民众的信仰三者达到高度的统一与和谐,从而使唐代的菩萨图像成为中国菩萨图像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一页。这在版画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观音菩萨图像形成最为庞大的独立系统。其二,地藏菩萨信仰形成。其三,文殊菩萨信仰形成(版画中有倾向于极乐净土的转移),由释迦牟尼佛的胁侍地位而发展为单独的骑狮像,再发展为与五台山相联系的图像系统。

(1) 观世音(梵文 Avalokiteśvara),又称观自在,略称观音。观世音在《观无量寿经》中是阿弥陀佛的左侍,与右胁侍大势至菩萨合称为“西方三圣”。《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云:“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实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敦煌遗书中关于这一品的文书有很多是图文结合,描绘了广大民众在碰到灾难时观世音菩萨随声而至的场景。观世音信仰约在东晋十六国时期传至我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宣扬能为世人解除灾难的观世音,得到社会广大群众的欢迎。佛教众菩萨中,最具影响和魅力的菩萨首推观世音,这是由于观世音一方面解决现实的苦难,又是弥陀的一个胁侍菩萨,负责灵魂为引路往生净土的工作,因而也是净土信仰的重要图像。在净土思想流行的时代,与阿弥陀佛同在民间有着最广泛的信仰,形成了“家家弥陀,户户观世音”的格局。从净土信仰的角度而言,造观世音的目的是要“往生净土”、“成正觉”、“登佛国”,达到佛教的最高境界。下面我们来看观世音版画。《圣观自在菩萨心真言念诵略仪》版画:上博 07(3296)之《圣观自在菩萨心真言念诵略仪》:版画,设色,五代,佚名,纵三九.九厘米,横一七厘米。画面采用上图下文的方式,上段画观世音菩萨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手持莲花,头戴化佛冠,左右榜题作对联形,亦各立于莲花上,分别为“圣观自在菩萨”、“普施受持供养”。观音身后有大月轮,座下有云气。下段文

字为“圣观自在菩萨心真言念诵略仪”,文字为“圣观自在菩萨心真言念诵略仪/夫欲念诵,请圣加被者,先于净处,置此/尊像,随分供养。先应礼敬,然后念诵。/一心归命,礼一切如来,离染性,同体大悲,/圣观自在菩萨摩訶萨。(愿共诸众生,一心头面礼,十礼。)/次正坐冥心专注,念诵/圣观自在菩萨莲花部心真言曰:/唵(引)阿(引)嚩(引)力迦(半音呼)娑嚩(二合引)贺(引)。/此心真言:威德广大,灭罪除灾,延寿增/福。若能诵满三十万遍,极重罪业皆得/除灭,一切灾难不能侵害,聪明辩才,随愿/皆得;若能诵满一千万遍,一切众生见/者,皆发无上大菩提心,当来定生极乐世界,广如本经所说。”

(2) 地藏菩萨,关于地藏菩萨与净土信仰的关系,由 S.197《佛说地藏菩萨经》中可见:“尔时地藏菩萨住在南方琉璃世界,以净天眼观地狱之中受苦众生,……地藏菩萨不忍见之,即从南方来到地狱中,与阎罗王共同一处,别床而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造地藏菩萨像,写地藏菩萨经,及念地藏菩萨名,此人定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从一佛国至一佛国,从一天堂至一天堂。……此人舍命之日,地藏菩萨亲自来迎,常得与地藏菩萨共同一处。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人们雕造地藏菩萨像的基本动机是通过造像来达到为生人“预修”功德或为亡人“追荐”功德,从而使人生死免遭地狱之苦,彻底从地狱中解脱出来。下面我们来看地藏菩萨版画。《大圣地藏菩萨像》版画:P.4514(5)《大圣地藏菩萨像》,榜书内容如下:大圣地藏菩萨/普劝供养受持/地藏略仪/一心归命礼,一切如来平等性同体/大悲圣地藏菩萨摩訶萨。/愿共众生咸归命,迴愿往生安乐国。十礼。/次冥心一境,专注念诵/地藏菩萨法身灭决定业障真言:/唵(引)鉢罗(二合)沫(半音)他(上)嚩娑嚩(二合引)贺(引)/此真言明有大威力,能灭决定重罪业/障,能除灾患,延寿护身。普劝四众志(至)/心念持,回愿同生无量寿国。

(3) 文殊菩萨:文殊信仰形成,版画中有倾向于极乐净土的转移,由释迦牟尼佛的胁侍地位而发展为单独的骑狮像,再发展为与五台山相联系的图像系统。《大圣文殊师利菩萨像》版画:P.4514(3) A 2.《大圣文殊师利菩萨像》一侧有榜书:“甲申年三月六日弟子比丘智端安置文殊[师]利菩萨”,甲申年(984?),北大藏 D081 号也有此版画《此

《大正藏》第 85 册,第 1455 页。

五台山中文殊师利大圣真仪略变》：上部左“普劝志心供养受持”，右榜题“大圣文殊师利菩萨”。下部“此五台山中文殊师利大圣真仪，变/现多般，威灵叵测，久成正觉，不/舍大悲。隐法界身，示天人相，与万/菩萨住清凉山，摄化有缘，利益弘/广。思惟忆念，增长吉祥，礼敬称扬，/能满诸愿。普劝四众供养归依，当/来同证菩提妙果。/文殊师利童真菩萨五字心真言：/阿_(上) 嚧_(引) 跋_(引) 左_(引)。/对此像前随分供养，冥心一境，专/注课持，回施有情，同归常乐。”

以上四种版画在敦煌地区广为流传，其中都以往生净土的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国为最终目的，反映了敦煌地区民间倾情于净土信仰的热潮。佛教净土信仰起源较早，可以追溯到印度吠陀时代。《梨俱吠陀》中就有“于彼处所，我获不死（Amita）”的境界。Amita即阿弥陀，其词源是Amitayus，汉译为“无量光”，这正是净土教主无量寿佛一词的来源，梵文音译即阿弥陀佛。西方净土思想的成熟与发展是在贵霜时期，即公元2世纪上半叶，地点是在印度北部。佛经中有关净土信仰产生的记载：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药王菩萨本事品》曰：“……若如来灭后，后五百年中，若有女人闻是经典，如说修行。于此命终，即往安乐世界，阿弥陀佛、大菩萨众，围绕住处，生莲华中，宝座之上，不复为贪欲所恼，亦复不为瞋恚愚痴所恼，亦复不为憍慢嫉妒诸垢所恼，得菩萨神通、无生法忍。”佛灭后五百年正相当于公元后贵霜王朝时期。这段不多的文字，也正是“西方极乐世界”的雏形描述。净土信仰在北印度形成后，迅速沿“北传佛教”路线向东传播，公元2世纪中国内地就有净土经典陆续译出。佛教净土思想在中国的兴起是伴随着净土经典的翻译和流布开始的，其渊源可追溯到公元2世纪后期的东汉灵帝时代。其时，支娄迦谶译出《般舟三昧经》和《无量清静平等觉经》（168—189）。及至三国，吴支谦翻译了《大阿弥陀经》（222—228）、《慧印三昧经》，曹魏的康僧铠翻译了《无量寿经》（252），后秦鸠摩罗什翻译了《阿弥陀经》（402），南朝刘宋时昙良耶舍翻译了《观无量寿佛经》（424），阿弥陀净土三经已经齐备。因此可以推断，至迟从公元2世纪末期开始，佛教净土思想便开始在中国萌芽，但净土思想的广泛流行是从东晋时期开始的。

净土信仰在东汉、两晋之所以如此兴盛，一方面得益于以上弥勒净土和阿弥陀（无量寿）净土思想和各类经典由印度传入中国，并出现了大量的中文译本。另一方面还与支谦、道安和慧远这三位高僧的推崇与标榜有密切的联系。

狭义的讲净土宗，指的是信仰阿弥陀佛、称念其名号以求死后往生其西方净土者。笼统的讲净土信仰包括弥勒信仰、弥陀信仰、药师信仰。药师信仰是指通过修行往生东方净土琉璃世界。弥勒信仰是指通过修行愿求死后往生兜率净土，南北朝时十分兴盛，其势力超过弥陀信仰，隋唐以后逐渐衰落下来。而弥陀信仰成为隋唐净土信仰的主流，正式成为佛教一大宗派。随着净土思想之发展，净土宗在唐代深入民间，在近三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对唐代世俗民众的心理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民众信仰净土的热情也促使净土绘画、雕刻等亦空前盛行起来。至唐代，净土的信仰最为流行，这与道绰、善导及弟子怀恽、承远及弟子法照、少康、慧日和怀玉等唐代净土高僧的推崇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经过善导等净土大师的推崇，净土宗信仰一度盛行起来。这种信仰在版画艺术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以善导（道）为例，善导，俗姓朱，临淄人，幼于密州出家，专修净土法门。太宗贞观十五年（641），至京师，在光明寺说法，造《弥陀经》十万余卷，画《净土变相》三百余壁，满长安中并受其化，有终身诵《弥陀经》十万至三五十万卷，日课佛名一万至十万声者。贞观十九年（645），往长安实际寺，盛弘念佛门。高宗时善导甚至于洛阳龙门督工建卢舍那佛，由于可见唐代最高统治者对净土信仰的推崇之高。长安这种净土信仰的热潮，迅速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了敦煌地区，并在敦煌民间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这种信仰的热情我们从上面的所列四种版画中也可以看得到。

（四）发愿文：敦煌石室中有此类印刷品数十张：当时富人还愿喜于神位前绘制佛像，佛像之下端则系以施主之姓名。贫者不能觅人绘像，自乐于施用绘像之副本。此类印刷品高可一尺许，阔为七八寸。上半多为观音及其他佛像。下部则为赞佛之文字。有为一板所印成者，有为两板而套印者。其中若干佛像，尚有挂纽，粘存于其上。因此部份涉

《大正藏》第9册，第54页。

陈明、施萍婷《中国最早的无量寿经变——读支道林〈阿弥陀佛像赞并序〉有感》，《敦煌研究》2010年第1期，第22页。

及内容较为繁杂，可独立成章，故兹处暂从略。

除了敦煌地区的版画之外，五代时期现有遗存的还有吴越时期的版画。吴越钱氏诸王都信奉佛教，铸造刻经很多。现发现不少吴越王钱弘俶在杭州发愿雕造的宝篋印陀罗尼经扉画，有的雕刊时间已进入宋代。

四、雕版印刷的全盛时期——宋元

由于抄写经文需要很长的时间，故而越到后来雕版印刷所占的比重就越大，直到几乎完全取代手写经文。据俄 01362《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志忍等施写大宝积经题记》所言：“当寺僧上件志忍一人，新戒释门法律法寿，法律戒慈，法律戒昌，法律庆因，法律义勋，法律戒忍，法律戒论，法师戒护，律师保戒，弥道行，造食女人阴氏，壹拾贰人等同发无上胜心敬写大宝积经壹部施入永安寺者，……太平兴国三年戊寅岁次三月十五日下手，比至六月十五日毕功，断手题记。”

敦煌地区发现的宋初版画有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刊行《大随求陀罗尼曼陀罗图》，纵四三.二厘米，横三二.一厘米。“施主李知顺”、“王文诏雕造”，藏英国及法国。而最具代表像的是《弥勒菩萨像》版画，刊于北宋雍熙元年（984），高文进画，僧知礼刻，纵五四.四厘米，横二八.四厘米，（日）清凉寺藏。画面中央为弥勒菩萨，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左刻有榜题“甲申岁十月丁丑朔十五日辛卯雕印，普施永充供养。”右刻为：“云离兜率，月满娑婆，稽首拜手，惟阿逸多。沙门仲休赞。”上部左上角有“越州僧知礼雕”，右上角为“待诏高文进画”。阿逸多即弥勒。高文进为北宋初年画院著名画家，甲申年为北宋太宗雍熙元年。

宋代发明了举世闻名的活字印刷术，使雕版印刷术逐渐娴熟而精练，在它的影响带动下，印染工艺也得到了较快地发展。最早的刻印佛经成型于成都，开宝四年（971）——太平兴国八年（983）雕刻的《开宝藏》，藏山西省博物馆。《开宝藏》成为以后官刻、私刻经文的源头。《大藏经》的刊刻与流通极大地促进了经典的传播，它以规模更大、搜罗完备、编排合理、应用方便使后人获益无限。而编撰、雕造《大藏经》作为一种综合的大规模学

术、文化、经济事业，积累下宝贵的经验，在多方面获益于当时，贻惠于后世。除了《开宝藏》外，宋初淳化间（990—994）杭州龙兴寺刊《大方广华严经》，台湾故宫博物院藏。辽圣宗统和八年（990）刊刻《契丹藏》。《开宝藏》影响了后来的《高丽藏》和《大正藏》（1912—1925）。

宋代继五代之后雕版印刷随着文化的繁荣而有较大的发展，雕印技术亦显著进步。刻印地区几乎遍布全国，河南开封、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眉山成为重要雕版中心。雕印门类大大扩充，既有经史子集的儒家经典，又有佛经道藏等宗教印刷品，民间读物也大量刻印，民俗性的图画镂版流行。其中既有官府刻印，也有私人刻书，南北各地开设的大量民间书坊、经籍铺则是雕版印刷的主力。自从雕版印刷兴起以来，敦煌民间百姓就通过在亲人的十斋日如小祥（去世一周年）翻刻佛经来为亡灵往生净土的作依凭，宋代仍然延续了这一传统，据俄 337《佛说竺兰陀心文经》，此镂刻经前部雕刻经文，后为题记，文曰：

- 1.《竺兰陀心文经》，大藏所无有也。元丰二年（1078），太
- 2.常少卿薛公仲孺死之三年，以地狱之苦不
- 3.能往生，依陕西都运学士皮公，公弼之，女求
- 4.是经，以解冤结，公哀许之。大索关中，获古本于
- 5.民间，饭僧诵之，一日薛卿复附语以谢曰：“赖公
- 6.之赐，获生天矣。”公诘以特索是经之意，云：“佛书
- 7.几万卷，冥间视此经犹今之时文，方所信重。故
- 8.一切苦恼，悉能解脱。予是以获其祐也。”今三秦
- 9.士民，竞侍诵之。
- 10.卫州管内僧判兼表白仁化寺净土院讲《唯识》、《因明论》僧贤惠校勘，
- 11.卫州管内副正仁化寺净土院主讲《华严经》、传《法界观》僧贤熙校勘，

王伯敏主编《中国美术通史》（第四卷），第336页。

王其钧、王谢燕《中国工艺美术史》，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年，第279页。

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257页。

李希凡总主编《中华艺术通史·五代两宋辽西夏金卷》（下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4页。

12. 承议郎杨康国男大名府乡贡进士据璞琉环琚
13. 瑄璫女四娘、五娘奉为
14. 亡妣金华县君石氏小祥，谨镂版印，施
15. 《竺兰阇心文经》五百卷，庶缘
16. 胜利，用浸广于善因，追荐
17. 慈灵愿早
18. 登于净土。
19. 元丰六年三月 日施。

雕版刊刻佛教经文在宋以后规模越来越大，形成了有完备体系的“大藏经局”，俄 01743 刊刻《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为“大朝庚戌年（1250）燕京弘法寺大藏经局印造记”。另外黑水城文献中，也有西夏时期雕印佛经、版画的大量记载。刻经方面，如 TK124《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为“夏天盛十九年（1167）秦晋国王施印”、TK129《佛说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如来陀罗尼经》为“夏乾祐十五年（1184）雕经善友众重开板印施”、TK136《六字大明王功德略》为“夏乾祐十六年（1185）比丘智通施印”、.N .78《夏乾祐二十年（1189）西夏文刻本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TK35《圣六字增寿大明陀罗尼经》为“夏天庆七年（1200）哀子仇彦忠施印”、TK137《佛说业报差别经》、TK142《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疏序》、TK58《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N .7038 西夏文刻本《佛说大威德炽盛光佛珠星宿调伏消灾吉祥陀罗尼》等经卷都是图文并茂，足见西夏时期雕刻技术之高超。版画方面，如 TK244《阿弥陀佛来迎》、TK289《大圣文殊师利菩萨像供养文》、TK288《四十八愿阿弥陀佛像供养文》等版画与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同类体裁的版画是同一模板刊刻而成的。另西夏刻本《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版画上还留有刻工姓氏。西夏时期彩印套版技术也发达起来，如《绢本彩绘十一面观世音菩萨像》、《木版彩绘西夏文陀罗尼曼荼罗图》、《绢本彩绘大势至菩萨》，由于技艺高超，时至今日，仍然彩色绚丽。

五、雕版印刷的巅峰明清时期

到了明万历以后，民间雕版印刷在前代的基础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佛经仍然被不断的大量翻

刻，明清小说中时见大规模的印制经文记载，小说尽管可能是虚构的，但是情节却来自社会现实。其中净土信仰比较流行的雕印佛经《陀罗尼》，以此雕印功德以为亡灵转生净土。如《金瓶梅》第 57 回《开缘簿千金喜舍 戏雕栏一笑回嗔》西门庆笑道：“姑姑且坐下，细说甚么功果，我便依你。”薛姑子就说：“我们佛祖留下一卷《陀罗尼》，专一劝人生西方净土。因为那肉眼凡夫不生尊信，故此佛祖演说此经，劝你专心念佛，竟往西方，永永不落轮回。那佛祖说的好，如有人持诵此经，或将此经印刷抄写，转劝一人至千万人持诵，获福无量。……如今这副经板现在，只没人印刷施行。老爹只消破些工料印上几千卷，装订完成，普施十方。那个功德真是大的紧。”关于明代印经的价格，第五十八回《潘金莲打狗伤人孟玉楼周贫磨镜》也有记载：……贲四往经铺里叫回银子，来回月娘话，……说道：“银子四十一两五钱，眼见同两个师傅交付与翟经儿家收了。讲定印造绫壳《陀罗》五百部，每部五分；绢壳经一干部，每部三分。共计五十五两银子。除收过四十一两五钱，还找与他十三两五钱。准在十四日早抬经来。”让薛姑子等印造《佛顶心陀罗经》的目的，文中说道是“赶八月十五日岳庙里去舍。”明代刊刻佛经的具体形质可见永乐年间的《佛说阿弥陀经》。

大概应了那句凡事盛极而衰，雕版印刷也不例外，民国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的印刷技术日益更新，雕版印刷的书画的历史也就进入了衰落，甚至完全被现在的高速度的印刷机器所取代。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国雕版印刷产生、发展，一直到鼎盛的历史来看雕版印刷一路走来的辉煌轨迹。即便是现代印刷的机器也是在以前历史积淀的基础上形成的。在中国雕版印刷史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对净土信仰的发扬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从五代阿弥陀、观世音、文殊师利、地藏版画，到宋代雕刻经《竺兰阇心文经》，直至明清大量的雕刻《陀罗尼》一脉传承下来，说明净土信仰在民间一直是被民众所向往的，是中国古代人民感情的一种积淀。

（责任编辑：石磊）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301—302 页。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第 308 页。